

日治時期府城士紳王開運的憂世情懷 及其化解之道

施懿琳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shyyilin@gmail.com

陳曉怡

崑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講師

mayfennel@gmail.com

摘 要

王開運是日治至戰後台南地區重要士紳。少時除接受日本新式教育，也受到父親王棟的漢學薰陶，是一位跨越新、舊世代的台灣知識分子。國語學校畢業後，曾任公學校訓導，其後轉進工商業界，進而跨足政壇。王氏一生雖得意於政商兩界，卻未曾中斷對文藝的喜好；特別是漢詩方面，留下近四百首作品，其中有為數不少屬感憤諷刺，憂時憫己，或托情寓物的言志之作。此外，王開運還是府城重要刊物《三六九小報》的創辦人之一。在其擔任《三六九小報》理事兼編輯期間，不僅為小報撰寫專欄文章，更發表了小說、短劇、滑稽短文等創作，文學表現相當豐富而多元。本文以 2009 年出版的《王開運全集》為依據，嘗試透過其漢詩和雜文的書寫，觀察這位府城士紳在殖民統治下的自處之道，並且從中拈出憂世情懷及其化解之道，作為本文論述分析的主軸，期望能呈現王開運在士紳名流的光環之下，隱而未顯的生命情調，及其對時代社會的深刻反思與關懷。

關鍵字：日治時期、台南、王開運、漢詩、三六九小報

◎ 收稿日期：2010 年 4 月 23 日；審查通過日期：2010 年 6 月 23 日。

一、生平概述與寫作緣起

王開運（1889-1969），字笑岩，號杏庵，筆名有幸龠、笑岩、王棄人、花仙等。¹生於高雄州岡山郡路竹庄，乃前清例貢王棟之子，自幼受到深厚的漢學陶養。日治時期就讀於台北國語學校，畢業後（1910）任路竹公學校訓導，1914年離職，轉向政商以及藝文界發展。先後擔任台南市西區役場首席書記（1915）、台灣銀行台南支店書記（1917-1927）、大東信託公司台南支店長（1927-1930）、台南商工協會長（1928）、路竹庄庄長（1930-1934）、台南市議員及州評議員（1932）、海南島海口市瓊崖銀行總經理（1944-1945）等職，此外又籌組成立南郡運送株式會社（1932）與永森記木材株式會社（1933），在台南工商業界及政界十分活躍。尤其他所領導組織的台南商工業協會，是當時相當有活動力的商會組織，一直到1938年台南商工會議所成立，該會才告解散（謝國興，2000：31）。除積極拓展商工業務外，王開運對民眾的福祉也相當關注，如1930年代表台南商工協會赴日爭取台南安平改為商港、爭取降低台民的稅金，並將這些意見發表在《台灣新民報》，引起不小的迴響。²同時，他對慈善事業的推展亦不遺餘力，因不忍看到地方百姓生活困苦，於是募集友人成立專門收容乞丐的「愛護寮」，³並於1929年擔任副會長。在文化事業方面，除了平日寫漢詩並參加詩會活動外，更於1930年與一群府城文人共同創立《三六九小報》，並擔任理事兼編輯（1930-1935），此時期也是王開運創作最為旺盛的階段。

戰後，於台南創玉豐行，經營進口布料。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王開運無故被捕，直至3月25日始在鹽務局長帥雲風的保釋下出獄。1950年應黃朝琴之邀，擔任台灣第一商業銀行常務董事兼協理，對一銀業務助益頗多。1951年膺選台灣省臨時省議會第一屆議員，對普及教育與發展台南都會皆提出積極建言。1957年組織「台灣詩會」，擔任副社長；1961年被選為「中華民國詩會」副會長，與中國來台人士于右任、賈景德，以及台灣本地詩人陳逢源、陳皆興、陳文石諸先生時相唱和。1969年因腦溢血去世，享年81。其哲嗣王神嶽於1988年為紀念先生百歲冥誕，蒐羅王氏詩作三百餘首，交由王紹齋先生輯為《杏庵詩集》付梓。20年後（2008），有感於王氏家族對先人作品與生平事跡

¹ 王開運在《三六九小報》上的筆名另有：花道人、花外仙、花哥哥、花探偵、花曼倩、花散仙、花債生、棄人王、棄人大王、變態偉人。

² 參考〈就安平港築港問題而言〉，《王開運全集·雜文卷》，頁12，原發表於《台灣新民報》，1930年7月16日；〈減稅問題與消費經濟的改善〉，《王開運全集·雜文卷》，頁28，原發表於《台灣新民報》，1930年9月13日。

³ 參考王開運曾孫輩為阿嬤吳淑美（適王開運次子王崧嶽）所做網站：〈美世紀：阿嬤的口述歷史〉（<http://www.meicentury.com/>）。

的重視，國立台灣文學館復委託學者進行《王開運全集》的編纂。希望藉此將這位歷經三代政權的台南士紳在文學、文化、政治、經濟上的貢獻，做更細膩而多面向的呈現。⁴

綜觀王開運一生，雖得意於政商界，卻未曾中斷對文藝的喜好，尤其在漢詩方面的表現最為出色。黃可軒（1940：317）謂其「漢詩造詣頗深，興到筆隨，其所吟詠每為人傳誦焉。」儘管王開運留下不少詩文作品，但在戰後纂修的《台南市志稿·文教志》⁵、《台南市志·學藝志文學篇》⁶，卻找不到他的相關介紹，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或許是一般人看待這位府城士紳，主要著眼於他活躍的社會參與和商工業活動，卻忽略了他文學創作上的表現所致。本文以《王開運全集》為對象，試圖就王氏詩文作品的內容特色做初步探討；從中掌握「憂世情懷」及其「化解之道」兩大主軸，與其漢詩文作品做勾連，藉此探索王開運所關心的時代課題是什麼？深隱在他生命底層的憂傷愁鬱緣何而生？他又試圖用什麼途徑予以化解？由於篇幅的限制，加上戰後王開運只有漢詩而無漢文的寫作，本文只討論王開運日治時期的詩文，戰後作品之探討則有待來日。

二、憂從中來，不可斷絕

從幾部重要的名人錄，如日治時期的《台灣人物評》（1929）、《台灣官紳年鑑》（1932）、《台灣人士鑑》（1937），以及戰後的《台灣地方自治人物誌》（1951）、《自由中國工業要覽》（1957）的介紹，都可以看出王開運在政商界的名望（王開運著，施懿琳、陳曉怡主編，2009：130-139）。他曾多次前往日本、中國，1933年在《三六九小報》連載的〈東游日記〉⁷就詳細記載了他赴日考察工商業的發展概況：參觀全日本最先進的磷寸（按：即火柴）工場、川崎明治製果工場、白鹿銘酒釀造工場、辰馬汽船會社、大阪商船本社，日記中也記錄了王開運東遊時頗為優渥的消費享受，如多次到三越百貨或松阪屋購物，並訂製洋服。這些活動顯示了王開運在當時所具有的社會位階及經濟能力，是遠遠超過一般台灣人的。據研究者指出，日治時期統治者對台人出國頗多嚴格限制，除了留學以外，一般人若想出國，不只要有能力負擔高額旅費，還要通過官方重重審核，因此若非稍具權勢或家境較為富裕者，不可能輕易遊旅（黃慧貞，2007：172）。由此看來，王開運以他雄厚的經濟、社會、文化資本，已然躋身日治時期台灣社會的上流階層，理當是一位世人眼中「功成名就」的實業家和政治人物，生命應該充滿了喜樂與歡愉，不致有太多的缺憾甚至愁鬱才是。

⁴ 《王開運全集》，分為《詩詞卷》、《雜文卷》、《文獻資料卷》三卷，施懿琳、陳曉怡主編，2009年7月由國立台灣文學館出版。

⁵ 葉廷珪、辛文炳監修，黃典權主修，趙阿南、羅旭升、許丙丁、韓石爐纂修，台南市文獻委員會編印。

⁶ 蘇南成、陳癸森監修，蘇文鳳、劉阿蘇、郭春合主修，賴建銘纂修，台南市政府編印。

⁷ 〈東游日記〉收於《王開運全集·雜文卷》，頁340-395。

不過，當我們實際閱讀他的漢詩作品時，卻發現其中滿溢著濃厚的憂煩苦悶；特別是在某些閒適悠然的片刻，在他筆下卻往往帶有迷離難解的愁緒，如〈春日遊開元寺作〉：

不為登高賦遠遊，開元彳亍小勾留。隨緣拾到青鴛舍，弔古雅尋翡翠樓。
蒼狗白雲情變幻，長松貝葉徑通幽。誰能參透三摩地，不管人間萬斛愁。
（詩 p.14）⁸

一行童冠共嬉遊，春日遲遲為我留。滌慮同參歡喜地，騁懷不止望春樓。
舞雩風流熙熙樂，科斗龍文字字幽。最好聽鶯攜斗酒，此間日日遣閒愁。
（詩 p.14）

為愛春光作快遊，北園勝跡暫勾留。曇花此日沿空砌，貝葉當年對綺樓。
佛最聰明能解脫，人來香積共探幽。徘徊不覺歸途晚，互答行歌一散愁。
（詩 p.75）

在春日遲遲的美好時光，青年王開運與友人「為愛春光作快遊」，前往具有歷史記憶的昔日北園探幽。藉著開元寺的清寧「滌慮騁懷」，試圖讓身心獲得安頓與紓解。但理應是歡快的青春之歌，三首詩的末句，卻同樣都出現了「愁」：「誰能參透三摩地，不管人間萬斛愁」、「最好聽鶯攜斗酒，此間日日遣閒愁」、「徘徊不覺歸途晚，互答行歌一散愁」；這種愁緒憂思，不只出現於此，還繼續漫衍到往後的作品中：

年來恥學杞人愁，消盡英雄壯士憂。到處已成歌舞地，陸沉誰唱古涼州。
（〈柏園以詩索和倏忽數日茲值小報有停刊之議乃率成三絕聊以塞責〉，詩 p.57）

欲憑一醉散千憂，統制時潮似水流。最是關心烽火地，不堪搔首鬢蓬秋。
移山漫笑愚公計，覓食難期巧婦謀。矯首風雲多變態，無言靜看夕陽收。
（〈遣懷疊用芳園即事瑤韻〉，詩 p.97）

敢將健腳惜殘年，乘興何妨且破慳。時事莫談心恐碎，倦遊歸去學耕田。
（〈和柯子祿君游大陸瑤韻〉，詩 p.92）

在狂風暴雨的秋夜，他感受的是「跋扈飛廉肆，天愁地亦愁」（詩 p.17）；在安平賞

⁸ 引文主要參考《王開運全集》，以下引文若出自《詩詞卷》，則於詩後標示：詩 p.□；若為文，則於文末標示：文 p.□，不再以當頁註說明。

月時，他想到的是「十年繁華等逝波，一生惆悵我居多」(詩 p.39)。1935 年 5 月 19 日他更在「靜室小言」專欄裡提到：「予數年來，命途多舛，厄運相連，以致夢境迷離，夜不成寐」。讓人不禁好奇，究竟王開運的憂愁與不安緣何而生？在看似得意風光的人生歲月中，究竟有哪些事情讓他牽掛繫念，以致紛擾生百憂？

1895 年日本接收台灣之時，王開運雖年僅 7 歲，對政權轉移之際所帶來的殺戮與戰爭，已有一定的體會。1914 年父親王棟過世，標示著舊時代的逝去；這同時也是王開運辭去公學校教職，遷居台南，開啓另一個生命歷程之年。1915 年 6 月次子鐘嶽出生，7 日旋即夭折；1918 年母親王黃菜逝世……面對至親的父母乃至小兒的逝去，甫才而立之年的王開運，實感極大憂傷。1923 年因傷寒住進台南土城醫院，治療一個月後出院。從他留存下來的兩張瘦削臉容的照片看來，這病對他的摧磨應該是相當嚴重的。這些事雖未見諸現存王氏詩文，不過我們可以從他 1914 年寫的〈病耳〉詩，以及往後他在詩作中提及有關「病」的感受，相互對照得到理解：

累日橫床上，呻吟歲月窮。肌寒頭怪濕，股栗耳偏紅。觸耳疑無竅，掀簾訝有風。
神前空拜禱，佛力渺無功。(〈病耳〉，詩 p.6)

其他如「一病深驚百念灰，誰教作孽自招災」(〈病職〉，詩 p.95)、「一病愁古今，無心問陸沉」(〈遣懷〉，詩 p.102)……親人的逝去，身體的病痛，都使得王開運無法以開朗的心情面對未來。在其雜文中，更可清楚的感受到王氏對有限生命變異遷移的深刻感受：所有的繁華榮耀，無論賢愚貴賤，到頭來終究歸於黃土一坯，豈不哀哉？

「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二語詠盡宇宙間一切事跡。古往今來，星移物換，幾許賢愚，同歸壞土；儘多榮辱，幻作蜃樓。不悟者，是誠堪憫；不空者，猶屬可嗤。然而悟得來，空得去，又將如何？反復思維，不禁茫然自失。(文 p.104)

人生苦樂，均一瞬爾。世人不悟，每多執著，殊不知吾人最執著者，莫如生命，乃一旦大限臨頭，無論賢愚貴賤，亦莫不同歸於盡，性命如是，遑論其他。可見人生之窮通得失，特一幻境耳。吾人能得執著念頭放鬆，則苦盡甘來，迷惘盡退。不然，雖處極樂世界，而利慾焚心，精神困頓，生機胥為所奪矣。(文 p.160)

與古來智者一樣，王開運在困厄的人生中，嘗試開啓巨視之眼，俯瞰滾滾紅塵，以明淨之心，了知生命的真相：是非成敗、窮通得失，轉眼皆將成為不復存在的蜃樓幻境。因此，對於世俗榮辱，可以不用太過介意。此理雖人人能懂，但能看透、參透，當下豁然開解者並不多見。因此，「憂生之嗟」自古以來一直是文人面對生命個體存在的感嘆。

即使衣食飽足無缺，即使事業一帆風順，即使有嬌妻美眷，賢肖子孫，生命還是不免有憾。所有的人事物，都不能逃離「成、住、壞、空」的必然軌則。因此，面對生命的有限，有人求仙修道、有人放浪形骸、有人透過書寫延續心魂……試圖藉由種種所能表現的方式，在迫仄的時空中，衝撞出些許生命的火花來。王開運在 1944 年所寫的〈甲申元旦〉，即是試圖以文字記下生命的印跡：

老至頻驚歲月奔，春風容易又登門。百年元日餘無幾，累代遺經尚半存。
梅下自憐寒骨瘦，眼中誰見布衣尊。紛紛世事原如夢，滄海桑田未足論。
（詩 p.78）

死生疲勞，繁華如夢的驚慌、無奈，不管在哪個時代，只要心靈敏銳者皆有同慨。這是一個巨大的生命課題，畢竟凡人皆難以逃離既定的生之枷鎖。但在王開運所處的 19 世紀末到 20 世紀中，由於台灣歷史處境的特殊性，國族認同的矛盾，成為多數島民共有的錐心之痛。在被殖民的命運之下，不僅傳統漢文化的逐漸墮頹，讓自小接受儒家教育的王開運憂心不已；當時知識分子的黨同伐異、政壇以至民間充斥的劣習惡俗，更促使他不時要以文字書寫來表達緣此而生的煩憂苦悶。以下即嘗試透過王開運的生命經驗及漢詩、文，分析其作品中所透顯出的「憂世情懷」。

（一）日治下台灣知識分子的故國情懷

王開運早年接受的主要是日本新式教育，但由於父親為清代科舉中人，從小受到漢文化熏染之故，成年之後還是具有強烈的漢族意識，屬於與傳統中國儒教文化關係較為密切的知識分子。面對被殖民的命運，性格穩健保守的王開運，並不贊成採取激進抗爭的左派路線，而以溫和的「介入社會」的方式，保有為民眾發聲的機會。除了任職較久的工商業協會會長、信託公司主事等工作外，王開運曾任公學校教師、區役場書記、台南市協議會議員、路竹庄庄長等職，與日本當局維持一個看似和諧穩定的關係。對於這段生命歷程，他在戰後 1949 年〈己丑九月十一日為予六一誕辰，回思往事無任感慨。因成紀事詩一首，錄呈諸親友郢政並乞賜和〉云：

……回首卅年前，壯懷鬱不申。擊壺時縱飲，沔酒或佯瞋。議會曾爭鬥，辭嚴氣益振。倭夷籠絡善，待我以儒紳。盛氣參文化，膽嘗更臥薪。婆娑春夢醒，掩淚暗牽巾。由是學韜晦，樂天⁹寄此身。當時誇盛會，轉眼忽成塵。啟釁蘆溝畔，翻成大戰因。癯夫難避免，遠謫海之濱。一旦逢光復，廬山面目真……（詩 p.120）

⁹ 作者註：「諸友好共組一生日會彥曰：『樂天』，每值誕辰，相與歡飲達旦，亘十餘年始風流雲散。」（詩 p.120）

這雖是戰後政權轉移之後寫的詩，不過從詩人的「現身說法」，似乎較能清楚地看出王開運在日治時期那種莫名愁鬱之所由生，也比較可以理解此時期王開運的縱酒佯狂與每言及「中國」時，筆下為何總是飽蘸深情與憂思：

誰識前朝舊井田，滄桑轉瞬恨難蠲。荒村弔古城南路，野廟尋詩海外天。
鴻爪惟存摩詰畫，琴心空負伯牙絃。乘槎我欲從君去，五岳逍遙作散仙。
（〈再次亞南宗兄瑤韻〉，詩 p.19）

黑雲淨盡晚晴新，泥滑沙平草似茵。挾勢雨風強萬弩，徹天兵火照邊塵。
虛窗怕讀前朝史，大地難容一酒人。自笑班超空¹⁰相，菜根長啖葆吾真。
（〈夏日雨後感賦〉，詩 p.80）

梨園絃管五音紛，台上清歌響入雲。轉眼興亡猶短夢，前朝盛事不堪問。
（〈羊城雜詠〉，詩 p.83）

敢將健腳惜殘年，乘興何妨且破慳。時事莫談心恐碎，倦遊歸去學耕田。
（〈和柯子祿君游大陸瑤韻〉，詩 p.92）

天荒地老未堪憂，大海回瀾孰挽流。一飯難期漂母惠，中原怕見楚江秋。
連橫樞軸誇良策，攘奪資源競遠謀。滿地瘡痍仍在目，機槍何日始全收。
（〈次南都即事韻〉，詩 p.97）

王開運往往以「故國」、「前朝」、「大陸」、「中原」指稱「中國」，而談及時也總有許多情難以堪與遺憾痛苦。儘管必須面對被殖民的命運，儘管已能坦然地面對作為「日本國民」必須承擔的責任，王開運對中國仍然有著血緣與文化上的眷戀與牽掛，他「怕讀前朝史」，因為「前朝盛事不堪問」；而漫天烽煙、遍地瘡痍的中原，更令他害怕談及中國的現況。「中原怕見楚江秋」、「時事莫談心恐碎」，中國——就像王開運不敢碰觸的脆弱瘡疤，只要一撩揭，便觸處成傷。

（二）對文化教育界變質的憂心

王開運畢業於國語學校師範部，又曾擔任大湖公學校訓導，對教育問題頗為關切，

¹⁰ 此字《王開運全集·詩詞卷》標示為「戡」，疑誤；筆者查閱原刊於《興南新聞》上之字跡亦無法辨識，故以○標示。

但他卻只在學校任職 4 年後便離開（1910-1914）。離職前他在《台灣日日新報》發表了〈將辭職偶作〉說明離開的心情：

人情世味總淡，苜蓿縱甘何良。果否為人為己，奚堪多惱多忙。嬌花窗下欲語，疏竹庭前奏簧。鶯叫枝頭聲急，行行歸勿徬徨。（詩 p.4）

何以教學竟使王開運多惱多忙，感覺如食苜蓿般淡而無味？在 1932 年 4 月的「幸蠶隨筆」專欄中，他曾多次撰文，道出當時學校師生關係的淡漠以及教育界的沉痾：¹¹

古人一日受業，則終身執弟子禮甚恭。改隸後，師弟風義日淪廢墜，徒之視師幾等傭奴。稍拂其意，則同盟罷課，群起而噪逐之。予少時，亦嘗為教師數年，雖僥倖未遭噪逐，終覺苜蓿無味。猶記棄職時，戲詠六言一首「果否為人為己，悉堪多惱多忙」蓋實寫當時心事，後讀東坡句云：「採得黃花成蜜後，為誰辛苦為誰甘。」益重此感。（文 p.154）

台灣自數年以來，學校林立，教育勃興，有進有文之士，殆如雨後春筍，簇出無窮。台人莫不望其施所學，出其蘊蓄，以實行利用厚生之道。誰知間有一輩，徒知囂躁傲岸，白眼驕人，則數薰猶莫辨，頑鈍無恥之儔，同志相仇，利權是競。棄社會於不顧，獨汲汲乎機緣利祿。此輩予無以名之，名之曰「主義職業化」，其庶幾乎？（文 p.157-158）

不只傲慢驕人，汲汲於利祿，當時許多教育界人士的學識和語文涵養在王開運看來，也大有問題：

或謂台灣教育，雖有駸駸日上之勢，但其所得學問，還是梁啟超所說：「裝罐頭的者居多」，且多養成一個半啞人物，每欲著一長篇議論，必要用幾句國語、幾句台語或幾句英語，拉雜湊合，方得暢達其意。若要他單用國語或台語，多難暢所欲言，至于英語，苟非專家，雖扯破喉嚨子，益說不成話矣。言雖過於刻薄，然今日之青年，其可無所反省也耶？（文 p.335）

¹¹ 當時公學校教師的處境與師生關係的淡薄，亦可從最近出版的第一部公學校教諭日記《黃旺成先生日記》略知概貌，除了同事相處緊有緊張關係外，學生學習的態度也不甚佳，黃旺城多次記錄到「學生很少，沒有活氣，教得比較困難」（頁 74）、「鄭氏三女的言語不像學生的樣子，傷感情」（頁 123）、「由於學生懶惰，所以無趣」（頁 124）。總之，日本統治下的台灣公學校，並不是一個具有元氣，令人教學感到快樂的地方。參考許雪姬主編，2008，《黃旺成先生日記》，台北：中研院台史所。目前只出版第一冊（1912 年）與第二冊（1913 年）。

這是日本殖民統下，難以避免的必然現象。不過，就能寫流暢漢文的王開運而言，這種非驢非馬的表達方式，實在無法為他所接受！由此，他對當時漢學與傳統文化的淪喪備感憂心。

日本的殖民教育，旨在植入日本文化，使台灣原本根深蒂固的傳統漢文化產生動搖，最後目的是要根本拔除之，這是大多數台灣知識分子共同關心的問題。王開運亦屢於報端，表達對漢學日墜的不安，並強調重振漢學的重要：

古人謂欲讀書，必先求識字，蓋知識字之難也，然不善讀書者，多病此。吾台自改隸以來，漢學日墜，一輩莘莘學子，亦多效古人，讀書不求甚解。而於字之音義，益覺傳誤不疑，如「出納」、「會計」等日常時用之字音，尚多不能辨正，以訛傳訛，殊可慨也。（文 p.138）

間有一輩青年，在平日直視漢文為無用長物。迨至近日，欲到海外覓職，而苦不識之無，乃深悔當時見識之淺狹，于是生擒活捉，冀可速成。殊不知臨渴掘井，萬來不及，且徒招世人之譏耳。（文 p.321）

爲了重振漢學，挽狂瀾於既倒，王開運於 1930 年 9 月 9 日與志同道合的台南文友共組《三六九小報》。小報表面上雖標榜以遣愁腸、開懷抱爲主，真正的目的卻是在振興並延續漢文（詳後文）。然而，報刊發行之後，竟遭不少攻訐批評，擔任理事兼編輯的王開運感慨道：

予自與諸同人，從事小報之編輯，原思荊天棘地，藉遣愁腸；風雨晦明，聊開懷抱。豈知自發刊以來，笑啼皆罪，動輒得咎於人。文字無靈，偏招不期之怨，鉛槧事業，烏可不慎乎哉……（文 p.170）

不只在內容上惹人非議，在文字語言的使用與參與成員方面，亦受到批評：

評小報者，非曰失之難解，則曰過於淺白。莫論如何，苟知漢學有提倡之必要，而又以讀書種子自命者，豈無匡正周全之一念？（文 p.320）

……或譏本報之刊行，為幾個舊式文人之高雅工作，謬承獎許，實不敢當。然對本報惠稿者，實不少青年有為之士。不細察其內容而遽下斷語，誠可謂暴君之論。（文 p.333）

然而，不管《三六九小報》如何殫精竭慮投入編輯，不管在文人士紳眼中，漢文具有什麼樣的重要性，在時代巨大洪流的沖刷下，《三六九小報》曾經因經濟問題左支右絀，停刊半年，¹²直至 1934 年 2 月 23 日才又繼續發行，此後一直到 1935 年 9 月 6 日正式結束運作，共維持了 5 年之久。這是日治時期，以府城為中心的文人群所共同營運的重要文化事業，其成果不容忽視。1935 年 5 月以北台灣文人為主的《風月》創刊，王開運以無比歡喜的心情，向讀者介紹了這個刊物：

台北風月俱樂部，者回創辦《風月報》，經自本月九號始刊矣。其體裁與內容，殆與本報大同小異，純以漢文為主。當此斯文不振、漢學淪亡之秋，本報雖力排萬難，砥柱中流，究不免有獨力難支之憾。今得是報之出現，何殊萬里沙漠中獲一知己，諸同人甚祝該報前途之發展，以誘掖後進於無窮也。（文 p.397）

而北台灣的「風月報系」確實也不負島內文士所託，一直到 1944 年始以《南方詩集》之名結束編輯，在日本嚴格管制台人思想的戰爭期，為台灣漢文界留存一縷命脈。

《風月報》發刊，王開運的歡喜之情主要來自：維繫漢文艱難萬端之際，能另有北台藝文機關，願意共同承擔延續漢文化的使命，實甚難得。但是，文人之間由於理念差異或私人恩怨所產生的兩相攻擊，甚至非理性的謾罵，卻也出現在不同陣營的報刊上。過去較為人知，刊佈於報端的筆戰有：1907 年《台南新報》的連雅堂與《台灣新聞》的陳瑚，就「詩界革命」議題引發兩端「筆戰旬日，震動騷壇」；1924 年由張我軍引發對台灣舊文學的激烈攻擊，以及舊文人的回應（施懿琳，2000：256-257）。此外，還有 1925 年由儒、釋知識社群所引發，且披露於報端的「中教事件」（江燦騰，2001：367-487）皆屬之。而在王開運的雜文中，又可看到 1931 年《台南新報》記者林本元、《台灣新聞》張淑子與《三六九小報》之間的筆戰：

日來予不知有何開罪於《南報》漢文記者先生，竟三番五次，必欲尋予鬧脾氣，而其所作文字，又極鄙不堪，讀之令人作三日嘔，如此愚蠢，何苦偏要滋事。

《南報》漢文記事，自林本元入社以來，則五花十色，光彩陸離，奇文怪文，別字啞字，連篇累牘，堆滿紙上，久為島內能文具眼之士所共賞矣。又何須格外炫能，牛皮力吹乎？嗚呼！無是非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汝曹既不知羞惡之為何物，予又何必多費一片婆心。（文 p.60）

¹² 1933 年 1 月 3 日，王開運刊於《三六九小報》的「亂彈」專欄云：「學堂欲廢漢文，則群議囂然，是知漢學之寶重也。使有人于斯，欲犧牲其精神物質，出為提倡是學，其必如聲響應，翕然從之也必矣！乃竟出人意外，事有大不然者，則如小報之支絀，實令吾人百思莫得其故。」收於《王開運全集·雜文卷》，頁 321。

當年「中教事件」的主角之一，台中的張淑子亦捲入這場論戰：

聞淑子在中報時，已屢次與人啟無謂之筆戰，其無自知之能力也明矣。明知故犯之狂徒，予又何暇與汝淘氣……如必欲與予玩笑，請以實際問題，或文學上之事，來相勗勉。予雖不文，儘可與爾輩周旋。不然，江淹才盡，徒作悍婦之謾罵，於文學上，既無毫厘價值；於文字上，亦增許多孽障。予當一切置之不理，莫怪予之不汝誨也。（文 p.60）

雖然一再的聲明與勸說，但《南報》的林本元與《中報》的張淑子對《三六九小報》仍舊持續抨擊（柯喬文，2003：50），王開運於是在《三六九小報》發表了一篇仿駱賓王〈爲徐敬業討武曌檄〉而作的〈爲小報討假名檄〉：

偽居士章氏者，獐頭蛇目，骨相寒酸。昔充白沙訓導，曾以賭博去職。迨被逐歸，穢亂鄉閭，潛行亂倫之私，陰耽不義之樂，鑽穴踰牆，甘心不齒於人；脅肩諂笑，媚容偏能惑眾。冒記者於濫報，掃斯文以塗地。加以狡詐為心，貪婪成性，聯絡群小，貽毒社會。背親不子，賣友求榮。戚屬之所共嫉，閭里之所不容。又復包藏野心，窺竊館地。東家愛女，誘之於桑間。鄰居孀婦，要之於橋下。嗚呼！大蘭王甘冒認，痞膏鼠可為朋。斯人操觚，知漢學之將墜；吾儕棒喝，恐文風之遽衰。

小報編輯同人，讀書種子。奉先之名教，延一線之墜緒。《三六九》之創刊，良有以也。不通桶之攻擊，豈徒然哉。是用驅逐敗類，志安良善，因民眾之失望，順島內之輿情，爰舉毛錐，以清妖孽。南連瑯嶠，北盡三貂。鐵筆成林，墨彈相接。海內同人，經笥之積靡窮；江湖名宿，吐屬之辭不凡！硯聲動而北風起，筆氣沖而南斗平。喑鳴則俗子崩角，叱咤則愚童變色。以此致敵，何敵不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克？

君等或居本地，或為同志，或著妙於寸楮，或構傑作於尺素。言能逆耳，筆可誅心，一壺之墨未乾，三日之刊可託。倘能斥曲援直，辨香識臭，共扶大雅之輪，不作違心之論，凡諸碩彥，共立戰線。若輩眷戀記席，濫竽報界，坐昧先幾之兆，必貽尸位之羞。請看今日之筆戰，竟是誰家之勝利！（文 p.62）

這篇文章的〈後記〉裡，王開運提及撰寫此文緣由：

假名章居士者，為文警戒狗報黨，然狗報固為俗子所自命，假名何異於林道乾鑄銃打自己，豈不怕俗子大展雌威乎？顧其運筆，似欲做討武曌檄，而未能者，因文中涉及小報，故率成檄體，為小報以討假名焉。（文 p.62）

此乃因張淑子以假名批評「狗報」（《三六九小報》）語氣過激，引起王開運大不滿而有的反擊。其後，王開運又仿劉伶〈酒德頌〉寫了一篇〈惡德頌〉以批評此等「惡德記者」是「行任指摘，居無室廬，談天說地，真空空如。」（文 p.64）由於資料欠缺，¹³對於彼此間的紛爭，目前無從進一步理解。不過，當時本應負有同樣使命的新聞界反而互相攻訐，忘卻拯救漢文的初衷，這才使王開運極為憤慨而加入了這場筆戰吧！

（三）殷憂社會風氣敗壞、倫理失序

改隸以後，台灣社會風氣的轉變是王開運十分在意的問題，他認為由於殖民者帶來的新視野與新思潮，使得台人競相推崇新說，炫才示奇，視傳統道德為冥頑不靈、腐敗無用之物，因此「父不父、子不子」，家庭倫理嚴重失序。此外，老派人士往往痛詆新人，凡事一知半解；有心者稍露頭角，又遭權勢家之忌，遂使社會意識混亂不堪，是非莫辨，有如群魔亂舞，令人憂心：

我台自改隸以還，競尚新說以炫奇，群目道德為腐敗，社會意識，混沌難明，碩學鴻才，盡作鳴高隱遯之思；迂儒駟儉，反逞橫行得志之勢。而一輩附羶逐臭，附和雷同，或乞憐昏夜，驕人白日者，又幾乎滔滔皆是。同人狙公，戲編新平鬼傳，或仍有慨乎此。憤時疾世，藉遣牢騷，如東坡學士，所謂一肚皮不合時宜，發洩而成文章者耶。（文 p.157）

作為傳統士紳，王開運對左派人物的思想有許多意見。1931年2月23日《三六九小報》「幸奩隨筆」專欄即批評無產運動者雖力倡階級鬥爭、攻訐富豪；但是，到頭來自身反而趨附權貴之門，頗為不堪：

昔一宦，於王荊石家，逢陳眉公問曰：「此位何人？」荊石代答曰：「山人。」宦笑曰：「既是山人，何不到山裡去？」蓋譏其奔走權門也。如今之自稱無產運動者中，有一輩，力倡階級鬥爭，攻訐富豪，而自身則反為富家所用，或日趨權貴之門，其氣骨之壞，視眉公不更下十萬倍乎？（文 p.111）

¹³ 筆者曾據此資料翻查目前可見的《台南新報》，可惜缺1931年的部份。《台南新報》覆刻本，於2009年6月由台灣歷史博物館出版，主要根據典藏於台南市立圖書館藏的《台南新報》覆刻重刊。

懷抱人道主義思想的左派，每批評右派人士的保守、妥協；新派指摘舊派亦然；但是，真正細查這些新派的左翼人士，是否真的就恪守其理想？王開運頗不以爲然：

吾人每見左之排右，新之訾舊，莫不議論堂皇，侃諤可聽。然一觀其私行之壞，人品之卑，每有更甚焉者，俗有「賊喊賊」一語，實可謂彼輩恰切之短評……（文 p.169）

彷彿有足以透視人心的明鏡，王開運經常以豐富的人生歷練，切中要害地點出時人的虛妄浮誇。1932年7月19日在「幸齋隨筆」中，王開運以過來人的經驗，強烈地指摘當代思想界（連同實業界）「口是心非」之惡劣習性，不管左右兩派皆然。行事之初，信誓旦旦，爲謀全民之福利；一旦稍得實際利益，則孜孜地位，貪戀權勢，全然忘卻原初的理想和主張，令人扼腕：

黨同伐異，幾成為現代風潮，新舊排擠，左右紛爭。然究其所爭內容，總不出名利兩途而已，實業家既然，主義者亦然。君不見我台青年中，昔時奉主義為金科玉條，滿口馬克斯、牛克斯，說得天花亂墜，口沫橫飛者，一旦榮昇顯職，亦不過死守官規，孜孜地位而已。欲求真能為台人造福，朝斯夕斯，念念不忘者，曾幾何人哉？方之實業方面，當其事業組織伊始，莫不開嘴同胞，合嘴同胞，洎乎大權在握，則發揮其資本主義之貪戾性，所有同胞幸福，主義主張，已盡拋諸九霄雲外矣。有詢之者，則曰：「予忠實其業耳。」噫！忠實其業，與忠實同胞，不知其輕重如何，使彼輩稍具人心，中夜捫心自問，亦應當汗流浹背。可知世之大言不慚者，非盡有宗教之信念，隨口胡謔，不過作一時的瞞騙世人之招牌而已。今而後，縱有再作是語者，雖喊破喉嚨，人當掩耳疾走，掉頭不顧矣。（文 p.170-171）

由此可知，王開運是一個重實際且言行力求一致者，生平關心的是台灣社會的進步改革，認為不能因立場差異而兩相攻訐，更強烈反對兩造間互相惡意詆毀。他曾有文章舉耶教與佛教之差異為例，說明應先深明其理，然後剔抉其非，不應徒作黃口之言，否則對社會全無助益。

在另一篇雜文中，他也曾以蘇東坡「桃符」、「艾人」之喻點出當時官場中有一輩僥倖獲官，依傍門戶，卻驕其鄉人者：

我台青年中，每僥倖獲得一官半職，則驕其同胞，不可一世。昔東坡謂桃符仰視艾人而罵曰：「汝何等草芥，輒居我上？」艾人俯而應曰：「汝已半截入土，猶爭

高下乎？」桃符怒，往復紛紛不已。門神解之曰：「吾輩不肖，傍人門戶，何暇爭閒氣乎？」當頭棒喝，安得盡書門神此語，各使若輩作特效藥服之耶？（文 p.98）

更直言批評當時的「政界大員」貪愛錢財，勒索賄賂因而醜態畢露，如同中國古代的宦官劉瑾、魏忠賢：

世人為惡，或本無心，或出有意，間有一念之差，而至累及妻孥，留污名於千載下者，如輓近之政界大員，每因納賄株連，畢呈醜態，雖曰政黨之弊，而本人亦可謂不思之甚矣。但自古以來，竊權舞弊，賄賂公行者，幾乎無代無之，一旦發覺，舉家籍沒，愚莫甚焉；考古來被籍之最巨者，當首推劉瑾之銀七千萬兩、朱綜之銀五千萬兩、魏忠賢之銀三千萬兩，若最近在內地鞠訊中之某顯宦所受者，則不過其芟芟者耳。（文 p.106）

除了批判從政者因品格與操守問題所導致的惡質風氣之外，王開運對台灣社會的風俗民情也十分關注，如普渡時的鋪張浪費，喪禮的崇奢繁瑣，都曾為文提出強烈批評，並積極提倡風俗之改善。1921年11月15日，王開運發表〈就普渡而言〉一文於《台灣青年》：

夫普渡云者，原欲救孤魂之饑、解倒懸之苦，意亦良善；第以宇宙之大，其受飢餓倒懸之厄者，豈獨率草台灣？不然自古迄今，孤魂惡鬼，悉啻恆河沙數，雖罄全台所有，尚恐不足以供一餐之用，夫何普施之有？況施之者，果為憐念無依孤魂而然乎？抑為冀邀分外福利而然乎？十手所指，十目所視，吾知彼輩雖能欺人，總不能自欺也。先哲云：「非其鬼而祭之，諂也」。祭之猶不可，況有所要求而祭之耶？是普渡之為迷信也明矣！……既知其非，雖為害不烈，亦當早除擯去。況其為習尚之害也，使子孫多長一迷信，一不利也；由個人經濟而言，際此金融困迫，糜費無謂之財，二不利也；由衛生言，珍饈羅列，須至魚餒肉敗而後食，三不利也。有此種種不利，禁之猶恐不遑，況敢因循而尤效乎？（文 p.8）

強調普渡將使子孫長養迷信，而且浪費錢財，更不符合衛生之要求，亟須毅然痛改，力挽頹風。但「台人普渡，已盡忘卻解倒懸之意義，但恐鬼之為厲，諂之媚之而已。或云：台人欺善怕惡，徵此益信。」（文 p.413）王開運憂慮普渡之俗難以改變，或許與台人對生死問題的不夠理解與欺善怕惡有關吧！

另外，對於台灣的喪葬儀式，王開運早在1929年就於《台灣日日新報》上發表〈喪禮宜改善〉一文，提出強烈批評：

顧台灣風俗，亟宜改革者，其惟冠婚喪祭乎？四者之中，如文明結婚、神前結婚、聘金廢止之事，已有見諸傳聞，行諸事實，惟喪葬一途，則刪簡就繁，崇奢黜樸……每見貴顯土豪喪葬，則大鑼執事，點主香亭、祀后土、司銘旌，逶迤街中，炫耀閭里。導師必邀內台，鼓樂猶須洋漢，又況生花放鳥，輓軸花環，參之以獅鑼鼓、南北管、孝男會、子弟班，名曰維新，其實俗化……雖至易簣，親友鮮為存問，迨聞訃至，則群往舉哀，競獻冥鏹，喪家耗財費時，慘怛多時。其對於死人，或可稱為盡禮，然家計前途、家人發展，多因是而阻礙。甚望有心人出而提唱，以簡素中禮為宗，節哀順變為本，省喪葬費為子女教育費，光大門楣，即慎終追遠之意也。當此物競天擇，經濟國難之秋，台民發軔，多有俟於習俗之改善也。（文 p.10）

日後在《三六九小報》的「幸齋隨筆」專欄中，王開運也感慨道：「故年來各地喪事，日見奢侈，藝棚鼓樂，幾如賽會迎神，噫！喪與其奢也寧儉，如此惡風凜俗，竟無一有心人，出為善導指正耶？」（文 p.131）希望有心人能起而善加指導，使社會風氣歸於純正。王氏曾有詩記載當時喪事情景：

鶴步蛇行穿五方，往來馳逐類迷藏。亡魂喝采誰曾見，世博喪家喜氣揚。
鑼鼓聲喧雜穢辭，壇前撲朔又迷離。道家誑鬼多奇計，鬼計誑人孰得知。
陰間路渺怕長征，借得龍駒○力輕。最好捉他同伴去，免教異地陌生生。
（詩 p.71）

為喪家經營法事的道士，在超渡亡靈儀式時，往來馳逐的景象竟似兒童的捉迷藏；而在喧天鑼鼓中夾雜穢辭，更使得喪禮哀傷莊重的氣氛盡失，幾如辦喜事般熱鬧喧騰。此詩以戲謔之筆描述當時民間眩奇鬥麗、踵事增華的喪葬習俗，透露出王開運對於治喪奢靡鋪排，深不以為然的態度。

由於殷切期望社會風氣能歸於純正，因此當王開運的妻子董阿柳過世時，其喪禮就特意朝革除陋習的方向舉行，果然獲得眾人肯定，主編《三六九小報》的趙雅福即對此事賦予很高之評價，認為王開運「破除習俗之功可謂大矣」：

杏庵夫人日前舉行葬式，廢止途中行列，其式場之嚴肅與排設，故實罕見。……杏庵斯舉，於破除習俗之功可謂大矣！¹⁴

¹⁴ 趙雅福（筆名碩）撰，文見於《三六九小報》，1935年3月23日，頁2「墨餘」欄。

不管是在看似散漫的閒談隨筆中，或是抒發感慨的詩作中，都可一再地看到王開運對社會習俗、世道人情變化的憂心與批評。1932年9月的「幸齋隨筆」中寫道：

如心曰「怨」，而台語則謂人心亂曰「如心」。嗚呼，怨乎？如心乎？予每思及台人之民族性，則不禁掩卷愀然，輒作如心之病。（文 p.173）

在王開運許多作品中，對於台人的民族性，有時是點到為止的批評，有時則發出激昂憂憤之語：「掩卷愀然，輒作如心之病」，這種隱抑在看似得意風光，縱橫商界與政壇的府城士紳內心深處的惆悵、愀然、愁慮、憂思究竟要如何化解呢？

三、何以解憂，惟有遨遊

面對生命諸多無解的難題以及環境的迫厄，或許只有不斷地透過空間的轉換——亦即身體的行動，心靈的自在遨遊，來抒緩身心的壓力與煎熬吧！因而，「遊」是充滿空間感與身體感的行動體驗（李紫琳，2007：2）。這種「遊」，同時也是一種「逃避」。文化地理學者段義孚（2006）認為，所有生靈中，只有人類在殘酷的現實面前，會選擇退卻。面對自然、文化、混沌以及人類的動物本性逼臨壓迫時，「空間移動」、「改造自然」、「建造有特定意義的物質世界」、「創造精神世界」，是人們選擇逃避的四種途徑。¹⁵王開運的「以遨以遊」，在本質上與這種「逃避主義」確實有若干合節之處。

（一）島內外旅遊

日本統治下，王開運或為「生之困厄」而憂，或為眼前現實的「殖民地命運與處境」而憂，如漢文化失根的危機、故國多烽煙的懸念、思想界的混亂、社會價值觀與人倫秩序的扭曲……在在使他有著「難尋乾淨土，暫寄苦吟身」（詩 p.92）、「插足可無乾淨土，舉頭徒喚奈何天」（詩 p.105）的深慨。那麼這位「閒來心事如潮湧」（詩 p.80）的台灣士紳，究竟如何化解自己內在鬱結呢？閒暇時候，他與友人四處遊賞佳妙風景，〈星期日同諸友遊舊港口作〉、〈春日遊開元寺作〉、〈遊台南公園作〉、〈同亞南宗兄遊法華寺賦呈斧正〉、〈安平泛月〉、〈遊崗山超峰寺詠〉、〈上巳日遊翠屏岩〉、〈遊超峰寺擬作似少雲韻〉、〈遊圓山公園〉、〈（台北）晴園觀梅〉等詩所描寫的就是這一類的遊賞活動。表現在詩裡

¹⁵ 「空間移動」，比如遷居到自己認為理想的地方。「改造自然」，人類許多生產活動所導致的結果，都是對於自然的改造。「建造有特定意義的物質世界」，用於滿足某種精神訴求。例如神殿、廟宇的建築。「創造精神世界」，例如美麗的傳說和動人的童話能指引人們「逃入」快樂和幸福的天界（參見段義孚著，周尙義、張春梅譯，2006）。

的美好景色固然令人愉悅，字裡行間亦是一派悠閒自得：「盡日逍遙過，澹然慮不生」（〈遊崗山超峰寺詠〉，詩 p.5）、「天然一幅郊原景，付與吾儕豁醉眸」（〈遊圓山公園〉，詩 p.4）、「路繞曇花堪玩賞，堂參貝葉自忘情」（〈偕友人遊崗山超峰寺〉，詩 p.7）。然而，如本文一開頭所說的，這樣看似開懷的遊賞之事，其中仍然有著文人隱抑的憂愁。白云「一生惆悵我居多」的王開運，本質上是多情易感而且不易開懷的人。他從雨後遊台南公園，領悟到「等閒消一日，似覺炎涼情」，人情的冷暖就如同天候的晴雨，如此令人捉摸難定；他在參觀充滿歷史印記的開元寺、法華寺之後，筆下映現的還是心中的千般愁與萬斛憂（詳前）。

如果遊賞島內的名山勝水，仍無法消解千憂百結。那就搭乘輪船，遠遊他鄉吧！1933年王開運前往殖民母國日本，其後在《三六九小報》上發表了〈東遊日記〉，詳載旅行所見所聞。在日記中他將日本若干現象與台地作對照，如「京都士女類多溫文爾雅，恰如我台赤崁舊都」（文 p.372），「寺在天王寺區，中祀四大天王，寺中不少高樓傑閣，唯荒廢不堪，且任諸小賣店，隨處搭架零賣，一如我南之媽祖宮廟口，殊覺褻瀆神威」（文 p.366），然而〈東遊日記〉裡，經過對照比較之後的觀察與思考，結果卻是台人（或中國人）多不如日人：

（到寶塚觀覽少女歌劇）其所搬演劇目，亦皆含有社會教訓，或諷刺滑稽等意。較之我台所演唱之依樣葫蘆，千古不變者，相去實有天淵之別……（文 p.348）

參觀各國公使館，莫不結構堂皇，備極華麗。唯南京街之中國公使館則未免湫隘短陋，相形見絀，然一般僑民卻似無何等感覺。夫對外神經之遲鈍如是，國家觀念之稀薄又如是，何怪其國威不振，屢受到列強欺藐也耶。（文 p.384）

往觀神戶中華會館，結構純用華式，頗壯觀瞻，惜近來華商歸國太多，維持似覺困難，張君曰：「中國人士頗具建設佈置之才，唯建設後不能十分管顧，半付自然，以致荒廢不堪，殊為可惜。」予曰：「中國人誠如是，然我台人，似亦不脫此病。嘗觀南部某富豪邸宅，外貌維極冠冕堂皇，一登其堂，則庭除積穢，窗几堆埃。令人一入其室，便想見其主人之人品如何，此猶為我等台人之不可不警惕自省者也。」（文 p.388）

這些旅行中的慨嘆，讓王開運的東遊之旅似乎背負著略嫌沉重的擔子；讓他「如心」（心亂）的台灣人特有的「民族性」，使王開運對島民的未來更加憂煩。緣此，藉東渡旅行以消解憂愁，成效似未盡理想。那麼，往西前往自己的文化母國——中國旅行如何？甫剛啓程之時，王開運確實充滿了乘長風破萬里浪的勃勃雄心：

破浪乘風學遠行，暫拋作嫁覺身輕。遊蹤到處留鴻爪，有句愧無擲地聲。
(〈將遊大陸留別諸君子〉，詩 p.18)

但是，幾次前往中國所累積的見聞，卻是令人傷痛不堪：

輕舟一葉片帆斜，激灩波光映晚霞。夾岸群岡成險陣，擺風叢竹亂如麻。
長期抗戰癡人夢，午夜驚傳隴上笳。錦繡江山仍舊在，可憐黎庶已無家。
(〈舟下江門〉，詩 p.82)

滄海揚塵已有年，哀鴻遍地淚潸然。功成一將悲枯骨，淒絕無辜盡壑填。
禹域沉沉烽火頻，與誰忍淚話艱辛。試看水秀山明裡，儘有山村少見人。
(〈赴佛山車中口占〉，詩 p.87)

侈說皇陵舊北園，銷沉王氣野花繁。我來欲問前朝事，石馬銅駝兩不言。
(〈謁瀋陽北陵〉，詩 p.91)

匝月分攜恍隔年，武林回首渺如煙。船唇馬首催前路，欲別河山意惘然。
(〈將別滬江寄懷諸友〉，詩 p.92)

連綿不絕的烽火，屍填溝壑的百姓，讓王開運忍不住潸然落淚。山河依舊明秀，前清王氣卻已消沉，而中國新的領導者要將民眾帶到什麼地方去呢？「長期抗戰癡人夢」應是針對當時政策的批評。然而若非親身前往中國遊歷，親眼目睹山河破碎，王開運心中對故國的眷戀恐怕更是難以消解吧！

(二) 遊於藝文

據 1937 年《台灣人士鑑》的資料所載，王開運的興趣在「漢詩、書畫」(台灣新民報社編，1937：33)，這種「遊於藝文」的取向，與當時部份台灣上流階層承繼漢人傳統文化而來的興趣頗為一致。據黃慧貞(2007：145、180)的研究，讀書、漢詩創作、書畫、園藝、旅行、棋藝等項目，明顯地為傳統漢文化的延續。其中，漢詩是多數上流階層所喜好的項目，尤其是 1930 年代，50 歲以上的人士，接受啟蒙教育在清領時期，獲得知識與文化涵養的來源，主要是私塾與書房，因此選擇以漢詩文表現的比例最高。當時屬於 50 歲年齡層的王開運，基本上較傾向老派的文人。雖然接受過新式的國語學校教育，而且在政治、工商業界都有優異的表現，但是他骨子底還是屬於舊式人物的興趣取向。1927 年江陰畫家詩人王亞南(1881-1932)因養病到台灣，王開運與他一見如故，

對其所繪花卉山水甚為激賞，他在其後為《王亞南詩畫集》所寫的序文裡說到：

王亞南先生，江蘇江陰人也。工南畫善詩文，為人風雅，倜儻謙和，所謂「大傲若折，大瘁若息，居之無形，捕之杳冥」者。嘗任北京女子大學教授，無何棄職而去，遂隱於詩畫之間，一琴一劍，枕高林，藉豐草，泛一葉之孤舟，矚之州之靈岳，瀟灑如也。丁卯年（1927）橐筆來遊台島，偶與余竹馬友張君振樑訂交於北投無名庵，余乃得獲親芝宇，一見如故，氣味相投，亦夙緣也。爾後君三渡蓬萊，過從甚數，滯台中所作花卉山水之畫甚多，而對於台灣風物如芭蕉、蝴蝶蘭等之寫生，尤多力作，雖寸縑尺素，莫不不翼而飛，迄今都人士什襲藏之。（文 p.68）

不只是畫藝的交流，兩人還多次以詩歌相互酬唱，王開運在在表現了對王亞南的推崇與傾心：「鴻爪惟存摩詰畫，琴心空負伯牙絃」（〈再次亞南宗兄瑤韻〉，詩 p.19）、「知君摩詰舊前身，活法生機妙入神……琴彈流水工詩畫，酒引如澗送主賓」（〈席上呈亞南畫伯〉，詩 p.19）。將其繪畫比若王摩詰，譽其撫絃如俞伯牙，對於這位來自故國的同宗，王開運摒除俗務，暫時忘卻現實的種種煩憂，以閒適的心情與「新相知」飲酒賦詩，彈琴說畫。這種心靈的交流與志趣的投合，確是人間一大樂事，也是王開運試圖在陰鬱的時代中尋找的生命之微光。

日治時期台灣各地詩社林立，王開運雖然未曾加入其中任一詩社，還是經常參加詩會活動，比如詩集裡收錄的〈秋海棠〉、〈觀奕〉、〈倦鶴〉、〈腹稿〉、〈荷蓋〉、〈問柳〉、〈採蓮艇〉、〈線蘭〉為台南「西山吟社」的擊鉢吟作品，〈金美人〉為西山、留青吟社聯吟之作，〈門神〉為「錦文吟社」擊鉢之作，〈春娃〉作於「曾北春季聯吟大會」，〈看劍〉、〈菊夢〉、〈秋扇〉、〈墨痕〉作於「台南秋季聯吟」，〈江上月〉、〈臘鼓〉、〈凍筆〉為「崁南詩學會」之課題，〈筆山〉、〈硯田〉、〈介子推〉為「桐城詩鐘會」擊鉢之作，〈文輝閣周年雅集〉則作於台南「文輝閣擊鉢集會」。這些詩社擊鉢，大多是文人遊戲騁才之作，與自己生命相扣合者甚少，或者較不那麼直接，比如以下作品：

壁隅簷際千縈繫，滿腹經綸世所希。太昊當時師妙法，于今還頌爾玄機。
吐盡經綸千萬縷，來將八卦佈玄機。伏羲若不師君法，今日漁權安悉歸。
（〈蛛網〉，西山吟社擊鉢錄，1931年7月15日）

盼到龍泉舞入神，淒淒風雨起埃塵。光凌牛斗寒凌水，只見霜花不見人。
萬丈鋒芒迷醉眼，一團氣焰繞間身。新磨巨闕雄心在，直向權門弑亂臣。
（〈看劍〉，崁南詩學會擊鉢錄，1933年10月15日）

這種屬於定時、定題、定韻、定體的擊鉢詩，本來就不容易讓作者抒發真性情。但是，就苦悶心情的解脫，或段義孚所說的「創造精神世界」的角度而言，文人的擊鉢遊戲之作，還是有其消憂解愁的正向意義。在純淨的文字世界裡，現實的喧囂或許得以暫時排遣吧！

除了擊鉢或應酬之作外，王開運的漢詩還是以內心真正有感而發的抒情言志之作居多。因此，讀其詩不能單純視為文人風雅的賞心樂事，而要嘗試探索潛藏在詩文底層，更深徹的思想、情感。針對王開運的詩觀，我們可以從他為台南文人《謝籟軒詩集》寫的序文裡，嘗試掌握一點訊息：

……時因言論不得自由，乃肆力於詩，感憤諷刺，憂時憫己，或托情寓物，鼓勵後進，冀得維持漢學之墜緒……未幾，先生以台灣非久居之地，遂決意棄儒就賈，遷寓於日本神戶市，時作娛憂紓之吟詠，山巔水涯之優游，絕口不談政治而超然乎事物之外。（文 p.70）

這段文字，有幾分王開運夫子自道的成分。日治時期的傳統漢文人在面對時代的憂患與生命的無可如何之時，往往「肆力於詩」，這不只是愉情悅性，表現風雅，更重要的想藉這種含蓄的文學「感憤諷刺，憂時憫己，或托情寓物」，並試圖維持漢學之墜緒。尤其面對時代的巨變時，更會藉由集結文藝社團，與同好互通聲氣，串聯彼此情誼。因此這類詩文作品，或是文友間的往來酬唱，大多是「憤時疾世，藉遣牢騷，如東坡學士，所謂一肚皮不合時宜，發洩而成文章者。」（文 p.157）頗值得注意。

日治時期王開運參與的文藝活動，除了上述的吟詩酬唱之外，主要還是表現在他擔任《三六九小報》編輯的文化事業之上。《三六九小報》乃 1930 年由一群以府城地區為主的傳統文人與新興知識分子共同結集而創設的小報，報刊的性質與名稱之由來，王開運曾在創刊號中說明：

不言大報，而稱小報，何哉？曰：無他。現我台灣言論界，自三日刊新聞以外，或月刊，或旬刊，或週刊，諸大報社，到處林立，觀其內容，莫不議論堂皇，體裁冠冕。本報側身其間，初舉呱呱墜地之聲，陣容未整，語或不文，所謂大巫在前，小巫氣沮，故不敢倣世人之妄自尊大，特以「小」標榜，而致力托意乎談諧語中，諷刺于荒唐言外。按：「小」字，從字義言為微細，從台音言，則與「狂」字同意，讀者以雕蟲小技視之可，以瑣屑微言視之亦可，以荒唐無稽之謔言狂語視之，亦無不可。至所謂「三六九」者，明示刊行日耳，每月于三六九日，計共

發行九次……蓋九三均為陽數，六則為陰數，陰陽接濟，上下融和，加以諸同人，乾乾惕若，庶可收本報有終之美，而三六九數之功用以明……（文 p.18）

該報的組織成員包括：前清獲得科舉功名的傳統文士，如趙雲石、羅秀惠等；也有同時接受傳統漢文化陶養和公學校教育的新世代，如南社少壯派成員趙雅福、洪鐵濤等。王開運雖非詩社成員，但卻又與南社¹⁶，以及後來的春鶯¹⁷、桐侶吟社¹⁸數位社員頗為親近。《三六九小報》的組織如下：¹⁹

發行人	趙劍泉
編輯員	趙劍泉、洪鐵濤、陳圖南、譚瑞貞
顧問	趙雲石
理事兼編輯	王開運、蔡培楚
理事	蘇錦墩、張振樑、鄧燦琳

這些是發刊時最初的成員，後來雖漸有調整²⁰，但是仍以上述幾位為該報的核心人物。他們大多是南社的前後期社員，或是王開運與同好組織的「樂天會」的成員。²¹王開運與趙雅福（劍泉、少雲、亞雲、頑）、洪鐵濤（野狐禪室主、刀水、懺紅）、蔡培楚（植歷、倩影）、譚瑞貞（恤紅、浚南生）、張振樑（柳軒）等人，運用不同的筆名積極地在《三六九小報》發表專欄文章或各種文類。此外，還有在此編制之外的鄭坤五、蕭永東等友人持續供稿，使得每逢三、六、九日發刊的小報，得以維持 5 年之久（1930-1935），著實不易。而難能可貴的是，無論是由編輯同人採訪撰寫的文章或是外來的投稿多是不支領稿費的，²²因此要維持報刊的發行，除了報費之外，很重要的是來自廣告的收入；王開運以其豐沛的政商資源和關係，對《三六九小報》的業務推展應是有相當程度的幫助（江昆峰，2003：158-159）。

¹⁶ 「南社」於 1906 年，由台南蔡國琳、胡殿鵬、趙鍾麒、謝維嚴、陳渭川、連橫、鄒小奇、楊宜綠、羅秀惠、王則修等人創立。

¹⁷ 「春鶯吟社」於 1915 年 3 月，由台南南社少壯社員洪鐵濤、王芷香、陳逢源、吳子宏、趙劍泉、陳圖南、高懷清、郭加我、白壁甫、陳清澤等人創立。

¹⁸ 「桐侶吟社」於 1923 年成立，公推吳子宏為社長，以王芷香、洪鐵濤、白壁甫及趙雅福為顧問，趙雅祐、許丙丁皆為社員。

¹⁹ 參考《三六九小報》第 5 號，1930 年 9 月 23 日。

²⁰ 詳見柯喬文，2003，〈《三六九小報》古典小說研究〉，南華大學文學所碩士論文，頁 50。

²¹ 1933 年王開運與台南友人組成樂天會，發會式上的成員有洪鐵濤、趙劍泉、張振樑、蔡培楚、蘇錦墩、王開泰、黃振耀、柯子祿、鄧堯山、蔡朝聘、李兆奇、李兆偉、張阿生、林泉生。其中《三六九小報》的重要成員都在其中；另外，王開泰為其三哥，黃振耀是負責印刷《三六九小報》的「鴻文活版社」的創辦人，與王開運亦有姻親關係；柯子祿、鄧堯山、蔡朝聘則是王開運友人。

²² 《三六九小報》於 1932 年 2 月 23 日復刊時，於〈本報復刊一言〉中提及「筆者之獻身效勞，筆無資潤，且勿論矣。」

王開運除了負責《三六九小報》的編輯與採訪工作，最重要的是，於此期間他發表了大量的作品，包括傳統漢詩、小說、滑稽短文、東遊日記以及專欄文章：「幸盒隨筆」、「亂彈」、「靜室小言」，另外就是與同人輪流撰寫的「花叢小記」。王開運當時的身份，除了台南市協議會議員、路竹庄長外，還同時是台南商工業協會會長，在繁忙的政商事務與活動中，卻仍然積極參與《三六九小報》的編輯工作，²³並撰寫文章，可以想見他對於文學創作的熱情，和對文化事業的看重。藉由這個「文化空間」的建構，讓王開運乃至其他文人漂泊苦悶的心靈得到了棲止之處；雖面對時代與環境的諸多變化，卻仍得以在這個自我構築的精神空間裡，試圖透過各種形式與題材的創作，與志同道合的友人間串聯起心靈的共鳴。

（三）遊於溫柔鄉

日治時期的台灣文人的消閒活動，除了吟詩、繪畫、園藝、旅行之外，其實還有一個重要的活動面向，雖未曾公開在土紳錄中呈現，卻可能是與土紳關係最深者，此即酒樓旗亭的風月冶遊。

在漢文化的歷史脈絡裡，文人與娼妓之間一直有著密切的關係。尤其到了唐以後，由於道教的普遍及世俗化，女冠往往成為男性詩人歌詠的對象；而女冠在宮觀中的諸多戀情傳聞，也成為這些文人想像書寫的重要題材（李豐楙，1996：18）。當時社會習慣以「仙」擬「妓」，使得魏晉以來藉遊仙詩寫不遇之懷的正統文學產生歧岔；「夢仙、會真、夢遊春」幾已成為娼妓文學的象徵符號，而這些隱語與當時教坊謠曲的音樂結合之後，遂成為晚唐五代，仙、妓、洞窟三位一體的娼妓文學（李豐楙，1996：89）。唐宋以降，由於教坊製曲的勃興，透過一定的藝文養成教育，造就出一群能歌善彈，亦能吟詠詩賦且才藝出眾的「藝妓」；「妓」緣此成為文人士子生活中的一部份，而這樣的風氣也影響到了日本文化而有所謂「藝妓」的產生。

20 世紀 30 年代的台灣風月文化，主要仍承繼漢人邀妓侑觴的傳統而來，另一方面也同時受到日本「藝妓」文化的影響。王開運的友人許丙丁（1954：19）曾撰〈台南教坊記〉，將台南地區的風月場所分為：清朝時期的娼寮、日治時期的貸座敷以及當時的酒家，若再加上日治中晚期以後大量出現的咖啡座，可看出當時冶遊之風的普遍。這種風氣的蓬勃，除了因日本的殖民現代性，使台灣進入消費型的社會有關之外，另一個隱存而不易察覺的原因則與當時台灣島民的苦悶有關。日本統治下的台灣知識分子在殖民地

²³ 在 1931 年 1 月 3 日的《三六九小報》「編輯餘滴」中有云「雙丸跳擲，歲月催人。諸同人於除夕百忙中，編完迎春稿事，遂各橐筆滌硯而去。」1933 年東遊日本時還不忘託人帶來《三六九小報》（1933 年 6 月 1 日），得以見出其對實際編務的投入程度（文 p.378）。

社會中遭逢種種困境，雖嘗試透過各種途徑尋出路，卻又處處碰壁，這種困窘與身世坎坷的煙花女子有若干心靈會通之處。就如同唐代白居易聽完琵琶女的傾訴後，發出「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的感慨一樣，失意文人與落魄歌女的情境原來竟如此相似。邱旭伶（1999：174）在〈文人對藝旦的感時借喻〉一文裡說到：藝旦貧苦的出身，特殊的才藝與不染污泥的風骨，多受到文人的肯定與疼惜；因此，不同時期的文人往往會對藝旦歌詠讚嘆，乃至透過各種不同的文學形式（詩、文、小說、戲劇、電影）來描述藝旦身上那種無法言傳的悲哀，以達到「借影自憐」的功能。王開運嘗試解脫困境與煩憂之道，也同樣採取沉醉於溫柔鄉的方式，借由醇酒美人安撫苦悶的心靈。而這樣的歷程，我們可以從他發表在《三六九小報》上與風月相關的詩文，獲得若干重要訊息。

王開運與風月相關的作品，最特別的要屬「花叢小記」了，這是《三六九小報》上的固定專欄，每期報導一位藝旦的相關新聞，除了介紹藝妓的容貌、才藝、身世遭遇，還有動態訊息的報導，文後則通常會以一首漢詩作為結語。此專欄的撰寫者經常出入藝旦間或酒樓旗亭，在杯觥交錯之際，藉著藝旦傾吐心情的機會，探訪其身世並將之記錄下來，足以撰寫一部充滿辛酸血淚的《台灣煙花史》。專欄的撰稿人除王開運外，還有洪鐵濤（鴛囚、花頭陀）、張振樑（柳軒）、許丙丁（綠珊盒主）等。根據江昆峰（2003：158-159）的研究指出，同時作為台南市商界領袖，王開運的交際應酬頗多，經常出入秦樓楚館，因此「花叢小記」的主要撰稿人非他莫屬，此說甚是。

觀察 1930 至 1935 年間王開運所發表的漢詩作品（詩 p.21-73），多是附於「花叢小記」之後，其中有描寫藝旦的姿態容貌、性情才華者：

相逢月下更傳神，髻髻瑤台一美人。安得乞將周昉筆，圖攜篋底喚仙真。
（〈贈潮州日春樓月桂校書〉，詩 p.27）

薄施脂粉勝文君，坐向筵前花氣薰。第一樓中推第一，閒情逸態擬秋雲。
（〈贈秋篁校書〉，詩 p.67）

輕軀細骨最條苗，醉眼朦朧媚態饒。如此容光如此色，美人端合署名嬌。
（〈贈天國女給政江〉，詩 p.65）

有貼近藝旦生平遭遇，感嘆其紅顏薄命、身世飄零者：

敢誇半載作良妻，未嫁時迷嫁亦迷。始信紅顏原薄命，隨風柳絮尚沾泥。
（〈贈寶蓮校書〉，詩 p.41）

留得梅花骨尚存，霜繁露重總銷魂。傷心怕撿纏頭錦，半漬平生血淚痕。
(〈贈小罔市〉，詩 p.24)

兩字情癡誤到今，蘭因絮果恨難禁。歌衫多少哀鶻血，盡是當年點染深。
(〈為阿玉校書賦詩一首〉，詩 p.62)

也有寫文人與藝旦間的纏綿情意、深情互動者：

故人相對更含羞，半晌無言怕舉頭。應為前情忘未得，平添舊恨與新愁。
(〈口占一絕紀盧生麗香重逢〉，詩 p.46)

一曲琵琶韻繞梁，可人碧玉冠歌場。春風喜得曾相識，真個魂消一段香。
(〈即席書一絕以贈四宜生與玉葉校書〉，詩 p.50)

廢吟香豔已多年，強向芳園一拂箋。舊夢迷離鶯侶渺，新歌宛轉鳳情牽。
煙花不遣隨春散，裙履何妨笑我顛。浪跡稻江歸思懶，同君且作醉中仙。
(〈席上率成一律示芳園與鳳英校書〉，詩 p.64)

這些風月冶遊的詩作，由於應專欄需要而寫，在內容上容易流於千篇一律，以致較乏藝術價值，但卻也具體印證了日治時期，文人熱衷邀妓侑觴，以及家庭生活之外的另一個情意世界。

那麼王開運又是如何看待自己涉足酒樓妓館之舉？對所謂「風月」之事作何解讀呢？他在《三六九小報》的「靜室小言」裡寫道：

山間明月，河上清風，雖則取之無盡，用之不竭。然欲談風說月者，正在吾輩。苟非文人墨客、風雅之士，總覺俗惡難堪；若市井中人，或胸無點墨，或略識之無，偶爾登樓買醉，擁幾個俗妓，談幾句穢語，亦詡詡然以暢談風月自負，則未免冤殺風月多矣。(文 p.400)

妓院中之行事，最風雅者，莫如品茶。弄煙品茗，輕彈低唱，幾為往昔妓院中一定之方程式。雖墜鞭公子，走馬王孫，猶不越此軌。(文 p.408)

在此，王開運以多層意義來看「風月」，它當然與歡場中的男女情愛有關，但，並不純粹只是情慾的消解，在杯觥交錯、輕彈低唱之餘，同時還要有文人墨客的清雅蘊藉，

或吟詩品茗，或戲謔諧趣。王開運曾描述綠珊盒主（即許丙丁）在天國茶店小飲的逗趣表現：

……綠珊盒主，更擅口技，其翻蓮妙舌，能令憂者為喜，哭者破顏。日前偶相攜到天國茶店小飲，到面紅耳熱時，君遂再開其懸河之口，使一輩女招待，盡為抱腹絕倒。中一號政江者，猶覺笑不可抑，歡極不覺顫聲俏罵曰：「廢人。」舉坐又為譁然，同人中有口占一絕，代為解嘲曰：「應是東方謫降身，偶從遊戲悟前因。美人倘解相憐意，名士何妨作廢人。」讀是詩，則君之風流放誕處，自可想見。（文 p.400）

王開運其實也坦承自己少有「好色之疾」，但是，他卻和賈寶玉一樣憐香惜玉，珍愛女性的柔情：

蓋如寶玉所言，女性屬水，其質溫柔時與周旋，頗足陶冶吾人性情，變魯莽為閒逸，故雖好而無害也。耿直之友，或以為予病，時作苦口之諫，然數十年於茲，冶遊之事，竟終不能屏絕，有負于良友好意多矣。（文 p.402）

台灣文人和藝旦之間，多是逢場作戲，罕有真感情者；²⁴但或許是因撰寫「花叢小記」之故，王開運在採訪報導之際反而深切感受到這些藝旦的真實情感，因此與某些藝旦間已建立了深厚的友誼，不再只是娼妓與恩客之間的關係：

寶惜滯南時，予嘗徵其局，鎮日作晉人之清談，而終不及于亂，蓋亦如程氏之所謂，目中有妓，心中無妓也。者回以事上北，因張君希進之邀飲，得再訪其香巢，相見之歡，有逾他鄉故知，乃信膩友之勝於淫朋萬萬也。（文 p.402）

「目中有妓，心中無妓」，確實是上乘的「修行」境界。由於能以平常心或體貼之心看待與自己同樣有困厄遭逢的風月女子，故而當一般人對娼妓極力詆毀時，王開運也頗願為妓申冤：

近日新聞紙上，恆見有論妓女之害者，極力醜詆，不留餘地。夫妓女之貽害社會，固不待言，然予以妓女之為害，當歸罪於惡鴉與社會，不宜專責彼輩弱者之妓女

²⁴ 據邱旭伶於1998年9月5日訪吳漫沙的訪談記錄，收在氏著，1999，《台灣藝姐風華》，台北：玉山社，頁221。

也。昔袁子才云：「妖姬從古說叢台，一曲琵琶一酒杯。若使桑麻真遍野，肯行多露夜深來。」如此評論，纔不失風人溫厚之旨。（文 p.409）

1935 年夏季，跨越新舊文學且為台灣政治社會運動的兩位健將——陳逢源（芳園）與葉榮鐘和王開運邂逅於江山樓畔，王開運作了如是記錄：

……一夕，（芳園）君偕葉君榮鐘出游，與予邂逅於江山樓畔，遂相將至奎府治處小坐。繼登江山樓，徵歌買醉，同坐尚有台中張、林二生，芳園審知諸人，俱為小彩鳳坐上客，乃暗召彩鳳侑酒。鳳至，殊覺左右難為位置坐上，唯予年齒最長，乃就予坐。而予則故命其轉坐於葉君右側，鳳不覺紅暈兩頰，蓋同人中，以葉君最為年少故也。葉君，工詩文，青年倜儻，英氣勃勃，唯平生頗謹厚。此夜則酒興大發，豪飲如澠，予老興亦為挑撥，遂相與縱飲高談。大有百杯狂李白，一醉老劉伶之概。歸時，予已酩酊，遽登彩鳳樓上，偃臥於其養父床中。見予登樓者，遍燭床下不得，而疑終不釋。翌日芳園猶以名士匿床下相訕笑，予因笑成一絕，以自解嘲曰：「浸潤居然老是鄉，熱腸銷盡換柔腸。應知杜牧狂仍舊，一醉何分上下床。」（文 p.405）

從中可以約略了解那個時代的風月概貌，幾乎所有的新舊文人都不能免於與藝旦的互動關係。而在這樣看似歡愉而開懷的場景中，心裡隱藏著時代家國之憂的文人士子，只能遁逃到溫柔鄉，在一次又一次的歌樓買醉中，銷磨了壯志。文中所提及的芳園（陳逢源，字南都）為台南人，曾參加南社組織，移家台北後仍經常與府城人士有密切互動，王開運便是其一。試看以下這組〈春日遣懷寄呈南都〉，頗能抒發兩人共同的心聲：

利鈍無心意自如，半庭花影晚光舒。纔聞舉國頒新制，鑿地誰人欲穴居。米珠敢望九年儲，暗祝禾生慶有餘。雨過滿庭喧鳥雀，詩書不補腹空虛。未慣逢迎笑老迂，安貧差免吏催租。消愁滿擬花間去，欲醉難期五日酺。好將傀儡付雲煙，名士由來不值錢。但得鶯花娛晚景，暫忘大地海成田。小櫻時節憶南都，白雪²⁵陽春不可摹。真箇萬金堪買笑，同君沉醉酒家胡。（文 p.405）

日治晚期，殖民者頒發新制度，雷厲風行地推行皇民化運動，要求全民奉公報國，意圖拔除台灣人的漢文化根苗，由於戰爭期物資的困窘，殖民者對台民錙銖必計，極盡剝削之能事。看到民眾物資困乏的窘況，想起歷經滄桑之變的傷痛，進而想「鑿地穴居」的王開運，雖嘗試讀書寫詩，卻無法消除心中的塊壘，最後只好選擇另一個逃避的方式，

²⁵ 作者註：「葉山敏子藝名『白雪』。」（文 p.405）

此即向花間買醉，暫時忘卻無所遁逃的煩憂。「但得鶯花娛晚景，暫忘大地海成田」、「真箇萬金堪買笑，同君沉醉酒家胡」，寫此詩時王開運約五十歲，已邁入前老年期的他，奮鬥了大半輩子，仍無法在日本殖民下真正開懷。無可奈何之餘，只能逃於酒、逃於溫柔鄉，暫時忘卻滄桑之痛與作為「傀儡」，任人驅遣、操弄的無奈和悲哀。

四、結語

本文以《王開運全集》為依據，嘗試觀察這位從日治到戰後都十分活躍的府城士紳在殖民統治下的自處之道，並且從其漢詩和雜文作品中拈出「憂世情懷」及其「化解之道」作為本文論述的主軸，期望能夠呈現王開運在政商名流的光環底下，隱而未顯的生命情調與文學成就。在搜集資料之初，所看的各種名人錄，或是生平事蹟的記載中，王開運總給人以功成名就，又或是一派名士風流的形象。但實際閱讀王開運的作品，卻發現在其筆下總是飽蘸深情與憂思，除了對生命薄脆的嗟嘆，更多是來自於現實世界的紛擾動盪：被殖民的痛苦、漢文化隳頹與道德風俗淪喪的憂煩，在在顯示了他深受傳統儒家思想的影響及敏銳善感的文人性格。無力撥亂反正的苦悶憂憤，使得王開運與多數的文人一樣，企圖嘗試以各種方式來排解、甚至逃避。悠閒又時髦的旅行也許是一種暫時的解脫，但仍不足以撫慰苦悶的心靈；將所知所感用文字記錄下來，似乎更能化解生命的焦慮。書寫不只是文人風雅的賞心樂事，更可以達到「感憤諷刺，憂時憫己」的目的。尤其是藉由集結文藝社團，與文友間往來酬唱，或是編輯報刊——《三六九小報》，都能夠讓王開運乃至其他漂泊苦悶的靈魂得到安頓，並展現對文學創作的熱情。但在積極「遊於藝文」之外，亦不能不探討為何王開運詩文中有數量頗多的風月之作，特別是「花叢小記」的撰寫。這個書寫取向一方面上承唐宋以來，詩人與娼妓關係密切的傳統；此外，也與日治中晚期台灣社會冶遊之風十分普遍有關，當時無論新舊文人皆常出入於酒樓旗亭之間，並以藝旦作為書寫對象，甚至藉由描寫身世飄零的藝旦以達到「借影自憐」的目的。因而此種沉醉於溫柔鄉的表現，不只是男性尋求家庭之外的另一感情慰藉之處，更是文人在無可奈何的時代下，藉由空間的轉移，建構另一「精神世界」。痛苦糾結的心靈緣此獲得稍稍的撫慰，而漂泊孤寂的靈魂也得以在此，暫時獲得安棲之所吧！

引用書目

- 王開運著，施懿琳、陳曉怡主編，2009，《王開運全集》，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
- 江昆峰，2003，〈《三六九小報》之研究〉，銘傳大學應用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
- 江燦騰，2001，《日據時期台灣佛教文化發展史》，台北：南天出版社。
- 李紫琳，2007，〈詩意的棲居：《楚辭》中的身體感與空間感〉，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
- 李豐楙，1996，《憂與遊——六朝隋唐遊仙詩論集》，台北：學生書局。
- 邱旭伶，1999，《台灣藝姐風華》，台北：玉山社。
- 施懿琳，2000，〈日治時期新舊文學論戰的再觀察〉，收錄於《從沈光文到賴和——台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高雄：春暉出版社，頁 229-269。
- 柯喬文，2003，〈《三六九小報》古典小說研究〉，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段義孚著，周尙義、張春梅譯，2006，《逃避主義》，台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美世紀：阿嬤的口述歷史〉，王開運曾孫輩為阿嬤吳淑美（適王開運次子王崧嶽）所做之網站，<http://www.meicentury.com/>，瀏覽日期：2010.03.30。
- 許丙丁，1954，〈台南教坊記〉，《台南文化》，第 3 卷第 4 期，頁 19-32。
- 許雪姬主編，2008，《黃旺成先生日記》（第一冊），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
- 黃可軒編，1940，《瀛海詩集》，台北：台灣詩人名鑑刊行會發行。
- 黃慧貞，2007，《日治時期台灣「上流階層」興趣之探討》，台北：稻鄉出版社。
- 葉廷珪、辛文炳監修，黃典權主修，1959，《台南市志稿》，台南：台南市文獻委員會編印。
- 趙雅福等編，1975 [1930-1935]，《三六九小報》，台北：成文。（據 1930 年趙雅福發行之《三六九小報》（1930 年 9 月至 1935 年 9 月）重印）
- 謝國興，2000，《府城紳士辛文炳和他的志業（1912-1999）》，台北：南天書局。
- 蘇南成、陳癸淼監修，蘇文鳳主修，1979，《台南市志》，台南市政府編印。
- 台灣新民報社編，1937，《台灣人士鑑》，台北：台灣新民報社。

Wang Kai-yun: Portrait of a Tainan Gentleman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Shih, Yi-li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Chen, Hsiao-yi

Lecturer,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Kun Shan University

Abstract

Wang Kai-yun was an important gentleman in Tainan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and Post-war ROC period. In addition to receiving the new Japanese education, he was also influenced by the sinology of his father, Wang Dong. He was a Taiwanese intellectual whose career spanned across the old and new. After graduating from the Mandarin school, he served as a discipline officer in a Japanese public school. Afterwards, he changed his career, entered the fields of business and industry, and further branched out into politics. Although he was successful in both political and business circles, he never discontinued expressing his preference for literature and art. Han poetry was his favorite, and he wrote about four hundred Han poetry. Most of the poetry was written for expressing his will such as “satirizing the government and expressing concerns with current events by using metaphors.” Moreover, Wang was one of the founders of an important publication in Tainan, the *San Liou Jiou Tabloid*. When he served as the director and editor of *San Liou Jiou Tabloid*, he wrote a column for the Tabloid, and also published his works such as novels, short plays, and comical articles. His performance of literature was quite abundant and diversified. Based on *The Complete Works of Wang Kai-yun* published in 2009,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Wang behaved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by investigating his writings of Han poetry and essays. This paper also analyzes his thinking based on his “concern” and “carefreeness.” It is hoped that his hidden sentiment of life and in-depth introspection and concern with the time and society under his title as a gentleman and celebrity could be presented.

Keywords: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Tainan, Wang Kai-yun, Han poetry, *San Liou Jiou Tabloid*

